

江西
人民
出版
社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王安石
曾巩 苏洵 苏轼 苏辙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

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

【谢先模（主编）】

【徐冰云

徐畏迟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谢先模主编

—江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0

ISBN7-210-01657-0

I. 唐……

II. 谢……

III. 散文，唐宋八大家—文学

IV. I 262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选

谢先模(主编) 徐畏迟、徐冰云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0月第2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320千 印数：1—8000册

ISBN 7-210-01657-0/I·328 定价：15.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5号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8511534(发行部)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唐朝韩愈、柳宗元，以及宋朝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号称唐宋八大家。所谓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两朝从事古文运动，并在散文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八位伟大作家。八大家之定名，通常认为始于明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之时。其实其名之定，还远在元代朱右（1314—1376）编选八家文章的年代，但右书不传世，故知之者甚少（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集部总集类八“唐宋八大家文钞”条）。

八大家既然是以从事古文运动被组合在一起的，因此，首先就不能不向青年同志简介“古文运动”的含义。

什么是“古文运动”？

“古文”是和“骈文”相对立的概念。它是指用文言写的散文体。它的特征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不同于魏晋以来所盛行的骈文（骈文是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为特征的）。这在文体上恢复了先秦两汉所普遍使用的散文体，所以称为“古文”。

唐中叶以来，韩愈等人提倡这种文体，以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结合成一个新的文人集团，大力从事于古文的宣传、推广和写作，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就是所谓“古文运动”。

一提到古文运动（确切地说，是古文复兴运动），人们就很容易与“复古”联系起来。其实，他们在思想内容上复儒道之古是有的；但从文体形式上说，他们口头上提倡恢复六经秦汉的古文，这只是

号召的幌子，实质上是在复古的口号下，改革文风、文体，去淫丽之风，骈偶之体，为质朴之风和散文之体。说得更明确一点，不是单纯去模仿古人，而是融会古代的著作，发展而为合乎时代需要的“新语”——散文。这是进步，不是倒退。

韩愈开创的古文运动，并非从天而降，其来也有自。它的发展，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总的说来，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社会背景发展起来的。而中唐儒道复兴运动的兴起，又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转变的枢纽。在此之后，均田制完全破坏，庄园经济加速发展起来，农民大批失地逃亡；中央集权实力逐渐削弱，方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内部各地，造成列镇相望的局面，朝政败坏，宦官当权，地主阶级内部的党争激烈。吐蕃、回纥等部族威胁着边防。社会呈现深刻危机，局势岌岌可危。在文化思想上，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与支持，佛道两教势力迅速增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乱后社会经济又逐渐由中衰转向中兴。稍后，手工业和商业，在唐朝前期发展的水平上，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就提供了重新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现实条件。一些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为了唐王朝的统一，维护封建秩序，抵御外患，便积极推崇儒学，以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于是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便得以形成。

韩愈极力鼓吹儒家先王之“道”，排斥佛老之学。柳宗元呢？虽在排斥佛老这点上与韩愈唱反调，但在尊崇儒学这一点上，与韩愈却是一致的。韩愈他们是怎样看待尊崇儒学与倡导古文运动的关

系的呢？他们并非明确认识到为了尽情地宣传儒学，必须进行文体的变革；但要用先王之“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六朝以来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文风，这一点是目的明确的。这对当时处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从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向前发展。

然而古文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更有它本身的原因。

上文已经讲到六朝以来的骈文，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为特征，当时作者们对此尽力追求，于是骈文便成了作家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可是人类社会是在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广阔与复杂，人们的思想便愈来愈精密、丰富，于是要求更准确、更细致、更自由地表达这愈来愈精密、丰富的思想的文化改变便应运而生。

追溯古文运动产生的根源，应看到西魏、北周时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一事，实际上这时就已开始。到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公开反对骈文：“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但苏绰模仿《尚书》，完全是复古之举，不合当时的需要。李谔用骈文上表来反对骈文的辞藻靡丽，骈体本身即需辞藻，文体不变，怎能奏效？故这两次变革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不过，这对唐代的古文运动的兴起，却开了先河。

初唐陈子昂于改变诗体的同时，也要求文体的改变，于是文风渐向好的方向转变。其后作者渐多，风气渐移。元结、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诸人，均提倡古体，不过尚未形成一个有力的运动。但柳冕的文学理论，实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韩愈、柳宗元继承前人的成就，终于成为把古文运动推向胜利的创始人。他们既有理论，又有创作的优秀成品。有了优秀的成品，那么其理论便更富有说服力，便更能得到文坛士子的信仰与拥护。有了群众作基础，才能形成有力的运动。

在古文运动中，韩、柳是并称的。主帅自然是韩愈，副帅才是柳宗元。韩愈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柳宗元与之并称并无愧色，两人各有千秋。只是柳宗元在政治上主张革新而失败，受到了牵连，人们贬低了他的作用。

韩愈(768—824)，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又因功曾升为吏部侍郎，称为韩吏部。早孤，由兄韩会、嫂郑氏抚养长大，从小刻苦自学。唐德宗(李适)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

韩愈在文学上从小就受到其兄韩会的影响，所谓“能为古文业其家”。同时又直接为当时也能作古文的韩会朋友萧颖士的儿子萧存所赏识。据范文澜考证，这次古文运动是从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开始的，元结继起，反贪虐政治，愈益坚决，其余如独孤及、萧颖士、李华都起着助长的作用。韩愈就在这种渊源和环境下，举起更鲜明的儒学旗帜。同时期内，没有谁像他那样态度鲜明、斗争坚决的。这种斗争几乎使韩愈丧失了生命(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处死刑)，但他那九死无悔的坚强精神，促使古文运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广阔道路——众体兼备。

韩愈不仅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家、宣传家，而且也是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家。他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形成一种富于逻辑性与规范性的文体。这种文体，宜于说理、叙事、言情，成为中古以来最流行的、切合实用的散文形式。语言的特色是精炼有力，气势雄伟，条理通畅，表现深刻。他不仅善于吸收古人语言中有益的养料来熔铸新词；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在当时全民语言中选择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或者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而成为自己的东西。他所创造的词语，大都言简意赅，生动活泼，有的已成为成

语，为后世人所普遍使用。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时号为柳柳州，又称柳河东。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唐顺宗时，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所革新，以打击豪族地主集团，以及与之相勾结的宦官、藩镇等反动势力。他们实行了不少激进的措施。然而执政只有一百四十多天，就因旧势力的猛烈反击而惨遭失败，并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失败后，柳宗元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后又改任柳州刺史。四年后死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

在哲学上，他有《天说》、《天对》等重要论著，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因果报应说。但对佛教妥协，有儒、释、道“三教调和”的主张，这点与韩愈正相反。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比之韩愈稍有逊色，这与一个佞佛，一个反佛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有着深密的关系。但柳宗元在散文创造上却又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柳宗元的优秀作品，几乎都产生在贬谪以后。由于他深入社会，接近人民，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穷苦人民的生活感情。值得人们首先注意的是他的寓言。那些寓言大都写动物故事，短小警策，意味深远，含蓄犀利，富于讽刺文学的特色。此外，柳宗元的短篇传记也是脍炙人口的。那些传记描写的是一些市民和农工大众，通过反映他们，表现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穷苦人民的痛苦。柳宗元又是郇道元之后刻画山水的能手。他的山水文有两个特色：一、他不是客观主义地反映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的感情寄托到山水里面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二、在山水的描写上，有细致的观察与深切的体会。运用最精炼的笔触、清丽的语言，把山水的本来面目刻画出来，生动形象，色泽鲜明，成为山水散文的杰作。

古文运动经历晚唐、五代又衰落下去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更为明显、直接的原因应是：

(一)从古文运动本身看：在思想内容上强调载孔孟之道，在语言形式上强调“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矫枉过正，产生了副作用。韩愈之后，李翱和皇甫湜就各成为一种倾向的代表。李翱作《复性书》，开宋代理学的先河，皇甫湜提倡“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的奇异风格，使散文创作走上了生僻、艰涩的道路。

(二)从时代特点看：晚唐、五代的时局特点是腐朽动乱，纷争多变。这严重阻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偏据一方的统治者大多贪图苟安，拼命追求享受，沉湎于纸醉金迷的醉生梦死生活。许多文人，迎合时风，也征歌逐舞，吟风弄月。士气和文风是互相影响的，于是和当日诗词中靡靡之音相配合的浮艳藻丽的骈文便应运复炽。与之相抗争的古文，力量实在太单薄了，整个文坛又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歪风统治着。

宋王朝建立后，一方面，为适应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骄奢淫佚的生活需要，五代轻靡文风，依然被御用文人承袭着；另一方面，随着新王朝统治下阶级矛盾的逐步激化，一些了解实际、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则提倡写反映现实的诗文。这样，就形成了宋初两种文风同时存在，互相对立发展的现象。

宋代第一个提倡古文运动的是柳开。开字仲涂，少慕韩柳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元。后改名改字，是自以为能开圣道之途的意思。但由于他缺少韩柳那样的生活实践，散文创作词涩意艰，并未取得什么成就；可是他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的主张，却对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影响。

与柳开同时倡导古文而创作颇有成就的是王禹偁。他对现实的敢于正视，构成了他的文学思想的进步基础，他又进而改变了词涩意艰的格调，形成了自己的古雅简淡的文风。

但王禹偁死后不久，以杨亿、刘筠为首的一批文人，噪集馆阁，

雕章琢句，此唱彼和，大煽浮艳之风，他们的诗歌创作形成了西昆体，与他们的诗风一致的骈文，也号称“昆体”，统治文坛三十多年，可是他们的浮艳文词，愈来愈遭到强烈的非难与反对，石介在《与君贶学士书》里说：“自翰林杨公倡淫词哇声，变天下正音四十余年，天下聩聩晦晦，不闻有雅声，尝谓流俗益弊，斯文遂丧。”直至宋真宗、仁宗两朝，连续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加之文士呼吁，于是改革文风的有志之士，相继涌现，显示出新古文运动准备期的活跃局面。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穆修、范仲淹、孙复、张景、宋祁、尹源、石介、苏舜元、苏舜钦等。但领导新古文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为宋代散文奠定基础而能上继韩、柳的，是欧阳修。

由于欧阳修对文坛的影响，产生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一群作家。他们便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位大家。尽管他们在散文上的成就并不一样，但他们目标一致，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的一条康庄大道。因此，北宋中叶是唐代古文运动以后的又一个散文繁荣时期，叫新古文运动时期，它对后世文坛的影响极其巨大。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水)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早年支持范仲淹，要求政治上有所革新，表现了他的进步性；但到了晚年，思想渐趋保守，最后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成了反对新法的保守人物。

欧阳修从小就倾慕韩愈，十多岁就立志学韩。二十多岁时，与尹洙等补缀校完韩文。古文革新运动经过他三十多年的努力，再加上他的志同道合者的有力支持，终于取得蓬勃的发展，竟达到“学者非韩不学”(《记旧本韩文后》)的地步。

欧阳修的古文运动，虽然直接继承了韩愈的衣钵，但又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第一，对“文”和“道”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把儒家之“道”与现实生活中的“百事”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作家如

果“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就谈不上能学得“道”,也不可能写出有益的作品来。他既认识到文与道的结合,也认识到文与道的区别。他的理论,不但纠正了李翱重道轻文的错误,也廓清了宋初古文家柳开、穆修等把文道混为一谈的弊病。第二,欧阳修等在与五代以来的怪僻、艰涩的文风作斗争中,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后世散文家大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风格。这也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欧阳修的各种体裁的文章,就是这种风格的最好代表。

欧阳修政论文、史论文的优点,苏轼作了最好的概括:“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居士集序》)欧阳修记事、抒情文的特色,苏洵又作了最恰当的介绍:“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嘉祐集·上欧阳内翰书》)对于欧阳修文章的总风格,吴充有一段精当的评论:“盖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之。”(《欧阳公行状》)以上三例,对欧阳修散文特点概括无遗。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奉召编校史馆书籍,在史馆任职时,曾整理校勘《战国策》、《说苑》等古籍。官至中书舍人。学者称为南丰先生,谥文定。曾巩的文论与创作颇接近欧阳修。他从史传文写作角度发挥了欧阳修事信、载大、言文的观点,又在《寄欧阳舍人书》中讲到只有“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明道的文章。这些文论都给了“文”以较高的地位。在创作上,以含蓄典重、古雅平易为欧阳修所赏识。谢无量谓其“典雅有余,精彩不足”(《中国大文学史》)。《朱子语类》曰:“南丰文却通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为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这大概是由于他缺少如欧阳修那样的生活实践,因而也就缺少欧阳修文章中那些透彻精辟的政治内容。《宋史》本传说他的文章“上下驰

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辞者，鲜能过也。”亦可参考。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封舒国公，旋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三年(1043)进士。嘉祐三年(1058)曾向仁宗上万言书，畅论时政，但不为所用。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的变法主张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订了一系列针对当时弊政的改良措施。这种改革目的虽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削弱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特权。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但由于代表大地主阶层利益的顽固派的反对，变法终于失败。王安石被迫辞职，并在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后愤郁而死。

王安石不但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文学家。他认为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至于形式之美，他认为只能从属于这个目的。他的为社会政治服务论，是正确的。但他的过激之处在于：把“文”的作用狭隘地局限在治教政令的直接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否定了文章艺术性的巨大功能。

但王安石的散文在宋代不失为第一流的作品。在以文章为政治服务和巩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他的政治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答司马谏议书》等，都是为变法服务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表现形式上，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论短说，都说理透彻明晰，结构严谨，概括性强。其他叙事抒情之作，亦颇能随笔挥洒，曲尽其妙，表现出驾驭语言的卓越能力。他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小品文，如《书刺客传后》、《读孟尝君传》等，这些评论历史人物的作品，笔力雄健，富有感情，文风峭刻。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与其子轼、辙同为北宋文学家,世称“三苏”。又后人称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考茂才异等皆不中,乃尽焚毁平生所作文章,闭门读书,更自策励,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仁宗嘉祐年间,与其二子同到京师,进谒翰林学士欧阳修。其所著《权书》、《论衡》二十二篇,欧阳修赞为“贾谊、刘向不能过也”。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

苏洵为文擅长策论。文章纵横捭阖,雄奇劲炼,得战国纵横家之精髓。当其初至京师,王安石见其文独曰:“此战国之文耳!”此语虽有文人相轻之意,然评价也还是正确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嘉祐二年(1057)进士,与曾巩同榜。初贬黄州(今属湖北黄冈县)。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惠州、琼州(今海南岛),遇赦北还。在内移途中,死于常州(今江苏武进县),谥文忠。

苏轼少时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每能语其要。嘉祐二年礼部试,主司欧阳修擢置第二,道:“我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苏轼的一生参政期间,正是新党和旧党斗争、倾轧激烈的时期。他开始站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方面,代表大地主利益,固执地反对新法。但稍后对新法的认识与态度有所转变,因此又与执政的旧党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以后,“新党”再度执政,这时新法已失去进步意义,成了一伙投机者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招牌。“新党”党徒对“元祐党人”进行打击报复,苏轼便成了其中的牺牲者。由于他长期被贬在外,广泛接触了社会现实和人民,故他的思想感情有同情人民的一面。他在施政上,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苏轼在政治上的遭遇,使他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均有所取,各有所用,形成了他复杂的思想性格,这些思想性格在他的创作中都得到反映。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他的书、画、诗、词、散文,在

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都是成就很高的。

苏轼的文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的《答谢民师书》、《答俞括书》是文论的代表作。这两篇文章，从创作的全过程着眼，把他心目中的“道”和“文”及两者的相互关系讲得很精辟透彻。他所讲的道，是“物固有是理”（《答俞括书》）的理，并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从这一点出发，他结合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讲“文”：第一个阶段，是“求物之妙”（《答谢民师书》），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物象物理“了然于心”（《答谢民师书》）的阶段，即酝酿构思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答谢民师书》）、“达之于口与手”（《答俞括书》）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把酝酿成熟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文章。完成了这三个阶段，便是他所说的“是之谓辞达”的“文”，它是“不可胜用”的（《答谢民师书》）。这种文学创作观，在宋人文论中是一种创见，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都是巨大的。

苏轼的散文也和他的诗词一样，其特色是：纵横驰骋，挥洒自如，或豪情奔放，或雄辩滔滔，结构变化多姿，语言明快畅达，其体平易自然，而又浑涵光芒，雄视百代。他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这是他自己创作的写照。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他又说：“某平生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春渚纪闻》）由此可以想见文如其人。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颖滨遗老。与兄轼同登嘉祐进士。王安石变法时，命辙为属官。安石行青苗法，他力陈不可，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旧党执政，召为右司谏，力主废弃新法，论罢蔡确、韩缜、章惇、吕惠卿新党人。其后中书舍人李清臣主张起用王安石变法派人士，苏辙上疏反对，因此又被贬官雷州、永州、岳州等地。晚年筑室于许（今河南许昌市），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

终日默坐，如是者将十余年，卒，谥文定。

苏辙的文章风格，大致与其兄苏轼的相似。虽不如其兄才气豪放，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书》》）其高处差不多与兄轼相近。

二

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选本（包括以八大家为主的选本）古已有之，流传至今的有好几部，各有其特色，也都起过它们的历史作用。为了借鉴，我们应该在此追溯一下。

考远在元末明初，有朱右其人，曾“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唐宋八大家文钞》），实为八大家文选的滥觞。惜右书不传，无法窥知编辑意图及书本面貌。朱右（1314—1376），字伯贤，一字序贤。自号邹阳子，临海（今属浙江）人。曾召修《元史》、《洪武正韵》，著有《白云稿》等书行世。

现存最早的八大家选本，是明代中叶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按《明史·文苑传》称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于唐宋文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亦效法编《八大家文钞》，并以唐顺之及王慎中评语引入。

《唐宋八大家文钞》选韩文十六卷，柳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每家各为之引。从其所选入的各家文章的份量来看，是首重欧、苏（轼）的。这很有道理，因为欧、苏对韩、柳所倡导的散文已有所发展。而在宋代的六大家中，又以欧、苏为巨擘。

考明代中叶散文作家有两派：一是复古派（由前、后七子所组成），一是唐宋派。文学复古运动是在弘治中由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起来的。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

他们盲目复古，以形式主义的摹拟，代替了文学遗产的合理继承，形成了一种佶屈聱牙的文风，走上了一条十分错误的道路，在创作上产生了明显的恶果。当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正声势煊赫之时，有的作家便起来反对。他们的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文学见解相近，推崇唐宋散文，并且有意识地把唐宋八大家当作典范来学习，因之被称为唐宋派。而《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纂，便是他们这种思想的体现。其书适应了反复古的进步思潮，故能广为传播，“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中国大文学史》）。

再说，八大家的全集非常浩博，学者遍读为艰；其后书肆中的各种选本又漏略过甚；而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子里的评语虽所见不深，亦足为初学之门径，可尝鼎一脔，故几百年以来，家弦户诵而不绝。

可是这个本子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它是专为当时的科举而设的。鹿门所述，原只是文之转折波澜而已，这是为适应八股笔法的需要才这样做的。他并未能探索文章之神理，有的地方，评论虽然也涉及到思想内容，但只是笼统地撷拾一些宗经求道的空话。对此后来有人讥之为“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四库全书目录·唐宋文醇》）至于评语疏舛过多，圈点批抹多不得要领，也是一个大问题。

至清康熙年间，有宜兴储欣者，仿茅坤《文钞》的体制，编纂《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于八大家外，增加唐代李翱、孙樵两家。储欣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所写的《总序》中自叙云：“唐宋大家之录，因也，非创也……故唐宋八大家之录，凡以为茅先生也，即所录加多，亦如治水者，前人导其源，后人扬其波耳，而岂有意乎为异哉！故曰因也，非创也。”考诸事实，也证明是这样的。就连其中标识，亦悉依茅本之旧。虽然他指出茅《文钞》的弱点，“大抵为经义计”（《四库全书总目·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但他自己的评点，仍没有摆脱经义

之计，一以儒家之观点为观点。

这个选本的优点有：

①辑评简洁精当。他在“凡例”中作了说明：“辑评尊前人也。惟精当而妙于言语者始掇之，故寥寥无几，备考便后人也。然必艰深者始稍加注释，其易晓及彼此集中互见者概勿注。”

②每评注一篇文章，必先了解时代背景、作者当时的处境及其创作思想。“凡例”作了如下的说明：“即读一篇，必考究年月，循其显晦顺逆之遇，以窥其所以言之意。”

③编纂前对每个作家及其全集均作了全面的考查，以定文章的取舍增减。“凡例”云：“余每读一家文集，必求之史传。旁及他书，下至稗乘所载，以想见其为人。”

④认识到文以气为主。他在“凡例”中评论唐宋大家文章时说：“词气并胜者唐文也，气胜词者宋文也。夫气胜词似不若词气并胜者尤光焰万丈也，然文固以气为主。”

这个选本的缺点有：

①此书取材评点，皆囿于儒家的观点。最明显的例子，如他对苏轼文章的取材时说：“余欲检先生禅喜文字及言神仙养生者入佛道士藏中。”（“凡例”十四）这明明是说凡苏文中杂有佛、道思想的，一并弃斥未选，不知割掉了多少千古流传的优美散文！对古人的思想怎能囿于一家之见以求全！

②对变法家王安石，采取了疾恶如仇的态度，不少地方直至进行人身攻击，表现了他反动、保守的政治观点。“凡例”第三条云：“介甫之文，余再三欲斥去，勿列大家，既而思之，以人废言，徒足骇怪学者之耳目，甚无谓。然其《答司马谏议书》之类，言辩而伪，不可之尤，余亟削之无所恤矣。”又如第八条云：“曾、王之文，并出经术，而其人则有舜跖之别焉。”至于第十三条所云：“按安石囚首垢面眼多白，面目可憎，而与神宗合若一人之身，岂可谓非天乎？”岂不是进行人身攻击么？像这样的话，触处皆是。